

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特征及其当代启示

郑若玲, 袁 卫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大学师生关系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贯穿于大学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其优劣与否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因此,大学师生关系也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民国教会大学在其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办学经验,其独具特色的师生关系着实耐人寻味。以民国教会大学的师生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生动史料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勾勒其隐藏在历史画卷中的生动图景,在当今社会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透过历史场景可以看出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主要特征有:导师制模式营造亲密和谐的交流氛围,多样化交流体现了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全方位关爱诠释传道授业的教育真谛。当前我国高校应大力推进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在人才培养的各层次均实行“名副其实”的导师制,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师生关系这种精神性资源的特殊优势,通过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师生关系和谐发展,以此锻造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师生关系;教育质量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8)01-0038-06

DOI:10.13763/j.cnki.jhebnu.es.2018.01.006

一、引言

民国时期作为一段仅有短短 38 年的历史存在,最近十余年骤然成为社会热点,催生了一种浓厚的“民国情结”,甚至出现言必称“民国”的现象,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在社会各界对民国进行的“集体性缅怀”中,教育又是其中最引发兴趣与关注的领域,从学界大师、西南联大、教会大学到民国军阀的“教育情结”、民国老课本……无一不让当下对教育颇多抱怨的人们抚今追昔、怀古伤今。如此种种,固然和人们与历史时空距离的远近有一定关系,但民国时期的确有不少可念、可论与可鉴的历史财富,民国时期的大学师生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在论及师生关系时曾提出颇有意味的“从游论”：“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P165)} 笔者理解梅贻琦先生的“从游论”包含的理念有三：其一，教师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与技能的传递，也体现为在心智修养、意志锻炼与人格养成等方面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也即唐代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在其著名篇章《师说》中所提出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之涵义；其二，学校为师生营造良好的氛围可使师生“如鱼得水”，有利于促成人才

收稿日期:2017-09-20

作者简介:郑若玲(1970—),女,江西修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史研究;

袁 卫(1991—),男,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史研究。

的熏陶与培养;其三,教师的学识与人品可以透过良好的师生关系来“濡染”学生,以达到“不求而至,不而为成”的教育效果^[2]。大学师生关系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要素之一,贯穿于大学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师生关系为研究对象,试图勾勒其隐藏在历史画卷中的生动图景,分析其主要特征,探寻其当代启示。

二、“充满温情”: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特征

历任民国时期多所著名大学教职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评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状况时曾谈到:“燕大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多。北大最少,师生间仅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清华又居两校间,此亦东西文化相异一象征也。”^{[3](P219)}钱穆先生认为燕京大学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在三所大学中最为密切,这虽是东西文化差异的一种重要表征,但同时也凸显了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民国教会大学,其师生关系与民国时期许多非教会大学相比较为独特的一面。民国教会大学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存在半个世纪左右,但其发展历程中许多成功的办学经验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回眸教会大学独具特色的师生关系,不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羨、充满温情的教育景象,其时的师生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 导师制模式营造亲密和谐的交流氛围

导师制最早出现在14世纪的牛津大学,是一种由教师对学生的学业、人生各方面进行全方位指导的育人方式,有助于加强师生关系、密切彼此互动。教师通过导师制可以更好获悉学生动态、发现其专长、指导其学习、促进其成长。导师制强调教师对学生的个别辅导及师生互动,导师制下的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学生可以经常找老师交流想法,获得教师的帮助及全方位的指导;教师也可以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有利于保证教育质量。20世纪初,导师制由欧洲传入美国,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等逐步实施^[4]。1916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借鉴美国一些女子文理学院的做法,率先在国内大学的教学管理中实行导师制。在以导师制为主体的教学管理模式下,金陵女大的“每一位学生可找一位导师,每位导师带八九个至十几个学生,用小组活动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生活上及其他方面的问题”^{[5](P2)}。从新生入

学直到毕业,每一位同学都由她的主修课老师全面负责^{[6](P114)}。由于教学效果优良,金陵女大的导师制被越来越多的教会大学所效仿。

教会大学为学生安排专门导师进行学业与生活上的指导,既有利于促进师生间的深入交流、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又可使老师根据学生的个性特长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学生的学识与品行,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冰心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忆起她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导师时与学生相处的状况便体现了师生之间的密切交流与互动:“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7](P16)}同时,她非常注重通过课外活动来了解学生的发展状况,如常常在未名湖划船或在湖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是与学生作个别谈话^{[7](P17)}。设置专职导师负责教学,通过个人指导方式对学生耳提面命、传道解惑,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集思广益、鼓励创新,可以使老师兼顾学生整体学业发展与学生个体化评价,对学生学业发展进行严格评价与及时引导^{[8](P117-183)},从而既可引导学生注重独立思考、触类旁通,也便于导师了解学生的学业水平,因材施教,最终令学生能够“审问、慎思、明辨,敢于质疑、创意、敢于独立思考”^{[9](P357)}。

2. 多样化交流体现民主平等的师生互动

民国教会大学师生的课内外互动甚为密切,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教师采用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例如,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导师“对于各导生本身之问题,莫不谆谆训示,或做个别之指导,或与实际之帮助。难题皆提出公开讨论,由导师予以指示,俾可寻得良好解决之方法,以达到相互砥砺同臻于善之理想”^[10]。燕京大学的做法也类似,“通过学习和实践,教师组织学生开讨论会,师生各抒己见,最后得出正确答案。在原图书馆二楼有专设的一间讨论会用房,供研究生用,本科生讨论会也可借用,当年新闻系埃德加·斯诺任教时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此外西籍教师如心理系夏仁德等还采用 At home(在家)的办法,每月约请选课学生到家供咨询疑难问题,并备茶点或接待饭食。气氛异常温馨,师生之间也增进了友谊”^{[9](P388)}。

民国教会大学的师生在交流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方式多种多样、风格各异、不拘一格,学生

们得以在这种民主平等、宽松开放的教学方式的引导下获得真知灼见,智识、品行与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师生之间的友谊也因此得以增进。作家萧乾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辅仁大学的斯诺教授:“这位教授在讲台上仿佛不是在讲学,总像在同学生们谈心,喜欢询问我们对这个那个事物的看法。他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多于灌输。更为吸引我们的是,在这位还不到三十岁的教授的身上一无‘教气’,二无白人优越感。当时斯诺和他的妻子佩格住在海淀一所中国式平房里,那里很快就成为我们真正的课堂,成为我们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了。”^{[11](P140)}这种由师生共同营造的温馨和谐的求知氛围,使大学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理想乐园。

3. 全方位关爱诠释传道授业的教育真谛

在民国战乱频仍的烽火岁月,许多学子因种种原因,生活不时陷入困顿。在温饱不济、学业随时可能中断的情况下,教会大学的学生总能收到学校和老师们送来的“及时雨”与“雪中炭”,不仅使他们摆脱困顿,而且对其人生态度与思想品格产生良好影响。一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回忆起老校长卜舛济博士时便充满感激之情、深怀感恩之心:“(卜舛济博士)对学生生活十分关心,每周五下午要到学生宿舍巡视一次,他对清寒学生也非常关怀。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先父病故,欠了一笔药费无法偿还。医院将缴费通知单寄到学校,卜校长召我去他办公室,我坦诚以告。过一段时间知道这笔药费已由他为我解决了。”^{[12](P398)}平日在校时学校教师就经常尽一己之力扶助贫寒学子,在极为艰难的抗战时期,由于许多学生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教师对学生生活的关爱也更为细致。例如,燕京大学为了帮助沦陷区学生因战争造成的生活和学习困难,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学生辅导委员会”(Student Welfare Committee)的机构,选举深受学生钦佩的 Siler 教授做主席,一来有利于帮助解决学生的日常生活问题,二来也便于对付日本人来学校找麻烦^{[13](P2)}。

正是因为受到教师如此细致的关爱,教会大学的学生对老师们深怀感恩之情,将母校视为一个充满着人情味的“大家庭”:“金陵的家族式精神已广为人知。这是个紧密联系的家庭圈子,德本康夫人如同母亲,教职员们如同姑妈,毕业的学姐们就像大女儿,在读的学生如同年轻的小女儿。”^[14]教会大学的教师对学生关怀备至,学生们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中与老师相处其乐融融,民国教会大学的师生活活动也因此成为一种“充满温情”的“爱的教育”。

三、“不为而成”:师生关系对教会大学教育质量的影响

师生关系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元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的培养效果,尤其是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古今中外许多教育家对此曾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论见,孔子认为师长在教育学生时师生关系的影响相当明显,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5](P152)}。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也强调:“教师本人是学校最重要的师表,是最直观的最有教益的模范,是学生生活生生的榜样。”^{[16](P161)}

早在 1909 年,时任牛津大学校长的科森爵士在评价牛津的导师制时曾自豪地谈到:“如果牛津大学有任何特别值得骄傲的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在历代人的生活和个性中都印刻了痕迹,并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妒嫉之情,那它就是神奇的个别教学制度。”^[17]这说明在教学管理中实行以导师制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师可以更专注于学生的个性特征而因材施教,以此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教育影响。民国教会大学在以导师制为主体的教学管理模式的引导下,十分强调教师对于学生的言传身教,师生之间的交流非常密切,教师在培养中注重采用多样化的交流方式,并在学业与生活上给予学生全方位的关爱。而且,师生相处的模式完全是民主平等的,在朝夕相处之间,师生共同营造了一种“其乐融融”的学术气氛,这种充满温情的师生关系对教学质量产生了良好影响。有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在多年后如此回忆道:“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教导我们怎样做科学工作,谦虚、扎实与不断地学习。”^{[18](P171)}在和谐的师生关系浸润下,许多青年学生跟随老师潜心向学、砥砺品行,最终在学业智识和德行修养方面获得了深厚的积淀,并奠定了他们日后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民国教会大学虽然办学历史短、规模小,在同时期的各类大学办学中业绩却最为傲人,例如,从 1919 年至 1922 年,金女大四届毕业生共 33 人,其中赴美深造获硕士、博士学位者有 20 人之多^{[19](P3)}。金陵大学前校长福开森更是津津乐道:“我们当教员的各尽所能教授学生。在我们学校受教育的人,在中国外交、商界、银行、教育界、医界和律师、牧师以及其他各种行业得了好位置。”^[20]即使是办学规模较小的东吴大学,虽然其规模和发展进程均不及上海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或金陵大学,但毕业生发展也相当引人注目,“当世邮务、电政、路局以及实业界中之桃李,强

半出我们”^{[21](P221)}。

得益于师生关系的良性互动以及注重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在许多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910年在广州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中,有260名学生报考,6个奖学金名额中5个是授予广州的教会大学学生的;5名候补者中的3名来自广州的教会大学^{[22](P273)}。1917年,清华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23](P471)},所占比例高达25%。民国时期曾有人对《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中第四版《中国名人录》中收录的名人就读的学校来源进行统计发现,被收录的960人中有620人曾在中国的学校就读过,而其中,毕业于教会大学的名人比例高达32%(197人)^[24]。根据《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的统计,民国教会大学发展早期毕业生人数相当少,直到1936年其总数才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25](P140-144)}。如此小规模的教育,却培养出较高比例的富有名望的毕业生,足见教会大学的社会声望与影响力之高。正是由于其卓著的教学质量,教会大学的毕业生质量在海外知名大学也深受认可,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的经历就是一例:“读了一年哈佛,系主任看看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单。既然我的课业都是甲等,他要我到殷内大学去选修‘莎士比亚’。我可以不上课而获颁硕士学位。后来我的硕士学位便是如此拿到的。”^{[26](P42)}教会大学的教学质量由此可见一斑。

透过民国教会大学师生温情互动的点滴回眸,可见当时弥漫于民国教会大学中那种自由、平等与开放的师生交流氛围,这种春风化雨的“无声”教育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使学生在与教师的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受惠于教师学识与品行的熏陶与模范,并在众多学子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种和谐滋养的师生关系也促使学生自觉地跟随教师的步调,自在地“遨游”学海、增进学业与品行,从而锻造了教会大学蜚声海内外的优良教育品质,较好地达到了人才培养“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教育效果。

四、春风化雨:民国教会大学师生关系的当代启示

自上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的师生比持续升高,全国普通高校的平均师生比已从1993年的8:1骤升至2013年的17.53:1^[27],二十年间比例上升高达两倍多。由此

导致教师对学生的关注度显著下降,师生关系疏离、冷漠、庸俗化的现象层出不穷,师生关系状况呈现日益恶化的态势。大学城和多校区办学,造成教师“有课才来、下课即走”现象,高校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大多仅局限于课堂之中。再者,大学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评价体系导向也迫使教师把主要甚至全部精力投向与自身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科研工作上,很难也很少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学生的培养与师生交流上,导致师生无形中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高校在评价教师的工作绩效时,通常过分侧重考核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以及课题的申报情况。这些硬性要求导致部分教师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中,从而很少有机会与学生沟通与交流,师生间只是简单平淡的主客体二元关系。师生间关怀缺失,感情逐渐淡漠,与高校的这种管理模式有着很大的关联^[28]。而学生由于缺乏教师的深入指导,对学习和学术的热忱逐步丧失,渐而形成一种对教师的不信任感,与教师在交往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功利性。例如,一些学生以教师话语权的大小和掌握学术资源的多少作为师生交往、选择导师的出发点;也有些学生平时忙于考证、学车、兼职等,经常逃课,考试抄袭、舞弊,为了60分过关,向教师要分数;而某些教师为了获得较好的评教结果,上课时取悦于学生,不敢严格要求;在一些学校,学生入党、评优、就业等工作环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利益交换的烙印^[29]。如此功利化和庸俗化的师生交往行为在高校中大行其道的现实局面,无疑是对大学作为“学术殿堂”这一盛誉的极大污损,也给高等教育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敲响了警钟。

在当下这种教育关系中,师生间交往频率过低,感情疏离,相互间严重缺乏关怀,由这种师生关系所主导的教育将学生锻造得“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大部分学生因此被塑造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30]。这样的师生关系状态不仅直接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滑坡,而且严重违背了教育伦理、颠覆了人类文明赓续数千年的“师道尊严”。著名教育家严元章曾说:“今后教育的改革,急需着力推行的首要工作,便是师生关系的改革;不然的话,就算是有最好的校舍与最好的设备,还是效果不大的——因为教育效果的提高,精神的因素,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31](P16)}通过对大学师生关系的今昔比照不难看出,民国时期师生相处温情脉脉、其乐融融,而今师生相处却“冰冷不

堪”,当前这种“异化”的师生关系状况不能不引人深思。

导师制曾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中得到广泛推行并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由中央政府部署实施的院系大调整政策将许多大学的院系和师生分解得支离破碎。后又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师生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骤然降至冰点,导师制以及原本应该存在的师生互爱、互信、教学相长等现象自然就不复存在了。改革开放后,有些高校在教学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改革尝试,建立了辅导员制,仅有少数高校试行了导师制,但截至目前,并未在本科生教育层次普遍建立起实质性的导师制。在辅导员制的管理体制下,大学辅导员虽然名义上是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上的“导师”和“知心朋友”,实际上只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兼带心理辅导的专职教师,且由于辅导员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监管性较强,学生在交流互动中缺乏主动参与性甚至持回避的态度。而且,辅导员的工作大多限于思政方面,在学识、专业能力乃至人生事业远景规划方面无法胜任指导工作。因此,当今辅导员制度主导下的师生关系与民国时期大学的师生关系性质相去甚远。《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导师制、小班教学,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改革教师遴选、考核与评价制度,实行聘用制,探索年薪制,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32]毋庸置疑,建立良性互动、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营造

愉悦宽松、寓情于教的培养环境,已成为当下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研究生层次普遍建立了良性的师生关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与导师之间,不仅经由课题研究工作在学业方面关联紧密,而且经由频繁的交往互动在学业之外也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师生感情。借鉴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的成功做法,笔者认为,当下我国高校应大力推进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在人才培养的各层次均实行“名副其实”的导师制。此举一方面可以保证师生间的密切交流,为春风化雨、立德树人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责任感,进而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在当今高校争相建设“双一流”的大背景下,高校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不仅是物质性资源与精神性资源的有机协调与融合,更是在大学自身的精神性资源的涵养中孕育而生的^[33]。高校应该充分发挥师生关系这种精神性资源的特殊优势,通过教学管理制度的科学改革推动师生关系和谐发展,以此锻造卓越的人才培养质量。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也无论各个时代的高等教育在形式与规模上如何不同,师生关系的“从游”本质从未改变。当下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应努力建设“教师引导示范,学生从游跟进”的良性师生关系,使其在当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不为而成”的作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必然呼唤大学师生关系回归其作为教育核心要素的“春风化雨”之本真。

参考文献:

- [1] 梅贻琦. 大学一解[A]. 二十世纪名人自述系列 梅贻琦自述[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 [2] 郑若玲. 大学魅力体现之(一)——大师[J]. 高校招生, 2012(10):32-34.
- [3] 燕京大学研究院. 燕京大学人物志(第1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4] 李东成. 导师制:牛津和剑桥培育创新人才的有效模式[J]. 中国高等教育, 2001(8):46+21.
- [5] 孙海英. 金女大大事记[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6] 李明珍. 我的回忆[A]. 金陵女儿编写组. 金陵女儿[C].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 [7] 冰 心. 当教师的快乐[A].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8] 新培培.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学生学业评价研究[D]. 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 [9] 张玮瑛. 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J]. 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42(5):11-12.
- [11] 萧 乾. 往事回忆——我的童年和学校生活. 为辅仁大学操劳毕生的英千里[A]. 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委会风云录编辑组. 风云录[C].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 [12] 秦希康. 圣约翰情结[A]. 熊月之,周 武. 圣约翰大学史[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3] 侯仁之. 我从燕京大学来. 燕京研究院[A]. 燕京大学人物志(第1辑)[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4] 金陵女子大学.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J]. 金陵女子大学, 1929(11):8-9.
- [15] 孔 丘著. 论语译注[M]. 杨伯峻,译注. 长沙:岳麓书社,2009.
- [16] [德]第斯多惠著. 德国教师培养指南[M]. 袁一安,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 [17]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University Reform; Being a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University of

- Oxford (1909)[A]. Carolina: BiblioLife. 2009:90. 胡守华. 高校本科生导师制研究[C].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12.
- [18] 崔吉君. 回忆由北平到成都在燕京医预系的学习[A]. 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19] 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鼓楼文史(第4辑)[M]. 南京: 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2.
- [20] 福开森. 教育部取缔教会学校之非是[J]. 兴华, 1930(38): 10-12.
- [21] 王国平. 东吴大学史料选辑[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 [22] 李建求. 世界走向中国 西方科技与教育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M].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3.
- [23] [美]卢 茨著. 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M]. 曾钜生,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 [24] 彦 堂. 中国领袖在地理上之分布: 四版“中国名人录”的一个分析[J]. 江苏学生, 1933(2): 22-33.
- [25]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3期)[M]. 上海: 广学会, 1936.
- [26] 林语堂. 八十自述[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 [27] 教育部官网. 各级普通学校师生比[EB/OL]. http://moe.edu.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4/2014_qg/201508/t20150831_204468.html. 2016-06-11.
- [28] 郑华萍, 巩 斐. 现代高校师生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前沿, 2011(4): 188-191.
- [29] 夏鲁惠. 大学师生关系亟待再构建[N]. 光明日报, 2017-07-04(13).
- [30] 腾讯教育. 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EB/OL]. <http://edu.qq.com/a/20150520/041737.htm>. 2015-05-20.
- [31] 严元章. 中国教育思想源流[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
- [32] 教育部官网.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342/201301/xxgk_146673.html. 2012-03-16.
- [33] 陈 丽. 传统与变革的统一: 大学的生存之道——研读《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J]. 教育与考试, 2016(2): 92-96.

O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in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Republic of China

ZHENG Ruo-ling, YUAN Wei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i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Republic of China in rel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ttempt to further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missionary universit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quality

[责任编辑 高小立]